

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

汤 勤 福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1102)

摘要: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 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 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 春秋以来人心渐失, 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他以道德、义礼、智巧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 确实很不科学; 他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 可概括为道德衰退论。他强调“人道为主, 不求天道”, 实际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代之以道德标准。他的历史哲学又与功利思想密切联系。在义利王霸问题上, 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 后世以霸道。他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 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 商鞅李斯等人继之, 于是王道衰败, 人心散坏, 争霸求利, 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但是, 叶适并非完全放弃功利之说, 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求得功利, 因此是一种王道功利论。

关键词: 叶适; 历史哲学; 功利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8691 (2000) - 01- 035- 06

学术界对南宋著名学者叶适是予以较多注意的, 然而, 对叶适的历史哲学及与其功利思想之间的关系, 语焉不详。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亦祈学者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两程、朱熹及南宋其他一些理学家在讨论历史发展问题时, 往往使用天理、人欲这一对概念, 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天理”制约的, 违背天理、顺从人欲则人类历史便产生曲折或倒退。叶适极少谈到天理、人欲这对概念, 也不采用它们来讨论历史的发展问题, 即使使用这两个概念, 大都是在批评两程或其他理学家时才转用他们的这些概念。那么, 叶适在讨论人类历史发展时使用什么概念呢? 下面先引证一段叶适的论述:

论世有三道, 皆以人心为本: 三代以上, 道德仁义, 人心之所止也; 春秋以来, 人心渐失, 然犹有义礼之余焉; 至于战国, 人心无复存矣, 先物而流, 造势为倾, 绵以出智巧, 驾漏以成事机, 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 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自汉至今, 学者欲求复于人心之所止, 则固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 则常患于不知; 其浮者不能顺德轨行, 则挠而从之众矣。^[1]

此段话极为重要, 叶适批判了汉代至宋代学者中质、浮两类人, 即以为质朴者不能论世道变化, 而浅浮者则不能顺德轨行; 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不知道“论世有三道, 皆以人心为本”这一关键, 即不是真正懂得“人心之所止”的道理, 也就是说, 无论三代以上、春秋以来、战国之后, 道德、义礼、智巧都是由人心所发, 而历史发展就在这人心沉浮中体现出来。显然,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 以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 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 春秋以来人心渐失, 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 这种以人心发展为线索来讨论历史发展的

轨迹，强调道德、义礼、智巧，以此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确实是很不科学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叶适在这里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是很难使人赞同的。在叶适看来，人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道，即人的道德观念。因此，可以将叶适的历史哲学概括为道德衰退论。或许许多学者对此会存在疑问，那么下面用叶适自己的语言来印证：

存亡之数，天也；使国之亡者，亦天也。夫以善代不善，以能代不能，上世以德，后世以智与力，是有以使之矣。天下之祸，无大于莫之使而自亡；自亡者，其人已矣。天下至大也，其存亡之数至难也。故其上则有至仁而伐不仁，其次必有英雄为之役，最下而奸雄之人或执其国家之命，势强力厚而不能舍。夫视其国本之所由与，或久或近，而有是三者，则其国不得不亡，是固有以使之也。^[2]

显然可见，叶适认为一个国家灭亡有三种情况：一是自己不仁，而被至仁者灭之（如汤、武灭桀、纣）；二是国家强弱，弱小者被英雄灭之（如项羽灭秦、唐太宗灭隋）；三是国家大权被奸雄之人擅夺（曹操于东汉、司马懿于曹魏）。其中“所谓有英雄之为役，亦天命之所宜然也”，“出于三者，则亦若天之使然耳。”^[3]这里所说的“上世以德，后世以智与力”，“德”就是道德，“智与力”即智巧；在上世与后世的关系上，叶适认为是后世不如上世，其落脚点正是在道德这一层面上，这是叶适以道德讨论历史发展的明确的注脚。而“存亡之数，天也”一语，则反映出叶适在难以解释“人心”为何促使历史转运变化时的无奈叹息，并不是他相信天命论，实际上，叶适力图将天（天道）与人（人道）分开，不承认天有控制人的权力，但又认为人必须敬天、畏天。他说：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愈天急，而人道尽废矣。^[4]

可见，叶适以圣人敬天、畏天来解释“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以为“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最终必然导致“人道尽废”的结局。叶适正是从是否“尽人道”来讨论三代与后世的种种差异，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尽人道以事天者，圣人也；（人道）与天为一，则学者之过也”。^[5]叶适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按经星之传，远自尧舜，而位置州分侯国始详于周衰。然则唐虞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春秋》记星异，《左氏》颇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至秦汉一变，诸侯权经，专地久，星官祖故书述旧事。今班氏所志（按：《汉书·天文志》），有其变而无其应者众矣，况后世乎！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比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者为君子者之所当阙也。顾乃学之以为博，言之以为奇，以疏而意密，则学者之所慎也。^[6]

显然，叶适所谓“天不以命于人”表示出坚决反对天命的主张，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则是指人心所求，而非天“意”，因此“古圣贤之所不道”。自然，叶适站在反对天命的立场来讨论问题，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他以“唐虞时诸侯尤多”来解释“星吉凶所不主”是没有道理的，显示他并不理解与懂得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在反对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以所

谓“人道为主，不求天道”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代之以道德作为标准，即以人心（或说人道）来讨论历史的演进，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还必须看到，叶适在讨论以人道为主，不求天道时，也批判过其它一些不正确的历史发展观，他说：

欲治天下而不见其势，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论治天下者，以为‘三代之时，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质，周之文，数百年而不变。其后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质、文之相代，若循环之无穷’。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于惠也，则莫若济之以威；强之失之于威也，则莫若反之以惠。惠止于赏，威止于刑，故赏不至于滥而无所劝，刑不至于玩而无所惧。’盖其意以为治天下之势无出于此矣。^[7]

叶适批判前人“忠质文”式历史循环论、批判以惠、威来讨论时代演化的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无可非议。

在叶适看来，道德沦亡、人道废黜、自然导致三代圣贤确立的“王道”消亡，而智巧、霸力百出；这一人道亡与智巧出的转变是自商鞅开始的：“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锋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8]，如此，“周衰，秦以力，楚以诈，始变三代之治为暴强之国”^[9]，人心散坏，道德沦亡，至后世则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叶适对商鞅等法家人物进行大力批判，叶适要求直追三代王道，因此对荀子的“法后王”的观点也不同意：“荀卿屡言为治当以后王为法，后王者，周也，意诚不差。然周道在春秋时已自阙绝不继，自一鲁外，诸侯视之皆如弁髦；孔子尽力补拾，其大者十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况至荀卿，王法灭尽之余，暴秦大并之日，孔氏子孙畏祸不敢，而独依然以无困难验之说叫呼其间，有轻易之情，无哀思之意，徒以召侮而不能为益也。”^[10]

正因为叶适持这种人心、人道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义利王霸问题。在义利王霸问题上，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叶适也称之霸力）。他认为霸道是“以势力威令为君道，而以刑政末作为治体”，因此，“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也。”^[11]正由于此，叶适对欧阳修赞美唐太宗是十分反感的：“欧阳氏《策问》……其言则虽以三代为是，而其意则不以汉唐为非；岂特不以为非，而直谓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则三代固不必论矣；故其制度纪纲，仪物名数，皆以唐为是而详著之。以余观太宗之治，曾不能望齐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几哉！然则欧阳氏之学，非能陋汉唐而复三代，盖助汉唐而黜三代者也。”^[12]显然，叶适认为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因此对欧阳修“助汉唐而黜三代”极为反感。在他看来，破坏三代的王道是始于管仲成于商鞅等人：“王政（王道政体）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13]而后世“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数百年之间，先王之政，堕坏亡灭”，“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14]可见，叶适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的，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而后世商鞅李斯等人继之，于是王道衰败，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

叶适在评论晋称霸时说：“是时晋霸未改，而其卿大夫不学无识，乃欲以私意断事，以气力雄长，晋之亡形既兆，而天下大势从之，三代之旧遂以沦胥，哀哉！”^[15]“三代之旧遂以沦胥”是叶适无可奈何的叹息。其实，在叶适说过：“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谋用为道称”^[16]，意思是管仲虽崇尚权谋功利，但毕竟还打着匡济周王室的旗号，与王道没有太大的出入。^[17]而后代之人则无管仲之才，如何能恢复三代王道呢？“天下之才，未有过于管仲者也，皆不若仲而已矣；皆不若仲，则皆师其故智而拾其遗说。……治变而世变，世变而俗成。然则后世之事，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而况于三代乎！”^[18]在叶适看来，“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19]，意思是三代之后王道愈为衰败，即使是儒家学者也是夹杂法家思而不自知。因此，叶适大声疾呼废弃霸道，依靠众人之力来逐渐恢复三代王道：“王政之坏，非一人之力；及其复之也，亦非一人之功”^[20]，“然则居今之世，理经援古，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者，以寒致暑而进病者于膏粱，不知其不能食而继之以死也，而何以为之哉！其欲为之者，植之有本，复之有渐，因今之弊政而行之，足以为之兆也。其继益久，其变益狎，将有待于后，则其复者固非一人之功也。虽然，可谓难矣。圣人不千岁而一起，圣人不继世而皆遇，无安得而俟焉！”^[21]叶适强调这种恢复三代王道是渐进而非突进，否则反而致其死地，只有“复之有渐”才能恢复三代之政。全祖望大约看到这一点，才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22]吧。

但是，水心并不是完全放弃功利之说，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来求得功利，实际是一种王道功利论。叶适很不满意“古今异时，言古则不通于今”之说，斥之谓是“摭古于今，绝今于古”，因为“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23]他曾举例道：“（汉）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为，惜乎当时无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间既已空缺数百年，高则有慕古之迂，卑则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后世去文帝时虽远，然其君臣议论执碍不行处，亦不过如此，盖未见有实能通之者”，在叶适看来，“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论古今”^[24]，即王道是放之百世皆为准的绝对真理，只有在王道的基础之上由“知治明道之士”“有所为”，那么三代王道是一定可以恢复的。他说：

世方相竞于作，则不知而妄为固亦无怪。自孔子回作为述以开天下，然后尧舜三代之事不至泯绝，性命道德有所统纪。如使作而未已，舍旧求新，无复存者，则人道废坏，散为鬼蜮，又如羲黄之时矣。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又著于大畜之《象》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5]

叶适将《象》作为孔子所作是错的，但他的重点则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上，否则，“舍旧求新，无复存者，则人道废坏，散为鬼蜮，又如羲黄之时矣”，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图画案呵！其实，叶适这一观点，与他所写的《汉阳军新修学记》中一句话是一样的意思：“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贫女之常性，而兴其俊秀豪杰之思，一其趋向，厚其师友，畜其闻知，广其伦类，极夫先王之道德之正，文献渊源之远，而一归于性命之粹”^[26]，“考正古今之俗”，“畜其闻知，广其伦类，极夫先王之道德之正，文献渊源之远”，正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注脚。显然，这种思想接近于吕祖谦在天理论基础上的畜德致用的功利思想，而与陈亮、陈傅良等王霸并用的功利思想有较大差异。^[27]自然，叶适的功利论也与吕祖

谦的功利论有差别，这一差别具体说来是吕祖谦还持“霸亦假王”的观点，而叶适则不同意霸道能借王道而行，这在他评论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时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在叶适看来，“修德者以为无事于功，责功者功成而德日削矣”^[28]，显然，他认为追求功利而轻视道德的修养，必然会产生“功成而德日削”的结果，因此霸道不可能借助王道而行。另外也应该强调指出，叶适的以王道为基础的功利思想与朱熹思想也有较大不同。因为朱熹虽然不乏经世致用的思想，尽管在他任官期间也做了大量有实效的事情，但他站在比叶适更为正统的儒家立场上，强烈地反对霸道，要求明确区分义利王霸，反对直接谈论功利。^[29]而与陈亮的王霸义利观点相比，叶适的论述确实是大为逊色。

那么，叶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以王道为基础的功利思想呢？从渊源上说，他脱胎于永嘉学派的理路，虽然对陈傅良的功利思想及永康学派的陈亮的“说王道霸”的功利思想颇有微词，但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功利思想。这在他的著作中有大量例证。其次，他向往的是三代的王道，所效法的是先王圣贤，明确指出后世不如三代，强调要求以众力来恢复三代王道，因此，他强调“因今之弊政而行之”^[30]，“顺三才之理，因当世之宜，举而措之而已矣！”^[31]这样，在叶适思想中必然表现为既批判说王道霸、又强烈地要求以三代王道为归宿的功利主义思想。再次，他对两程、陆九渊、朱熹等人某些思想观点也不同意，尤其对他们自称继承先王道统的言论大为不满，于是，叶适从源头上反对他们的道统论，同时也以继承道统自命。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撰文论述，在此不再详论。^[32]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叶适究竟是不是完全继承了永嘉（或说浙东）学派的大成？事实上，叶适的事功思想与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学术界对是否存在永嘉学派是有不同看法的。^[33]这里先引全祖望的一段话：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向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34]

这段话是学者们经常引用的，但在解释中只强调叶适继承了永嘉学派先辈思想，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全祖望所说的“其学始同而终异”，是指叶适在学术的最终归属上与他前辈存在着明显差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则是说叶适抛弃了永嘉诸先辈的那种功利主义观点。全祖望指出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始同而终异”，即两者存在着差异是正确的，但说永嘉功利之说被叶水心“一洗之”则是不正确的。关于前者，宋末学者黄震已经注意到了：“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九渊）；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陈亮、陈傅良）；至于朱（熹），则忘言焉。”^[35]显然，在宋代末年，叶适这种不满意陈亮、陈傅良的功利之说已经受到学者的注意了。然而，全祖望与黄震虽然看到了叶适与两陈的差异，但他们没有进一步分析叶适有关功利的论述及与他们究竟差异在何处、也未深入分析叶适的功利观点接近宋代那一位主张功利的思想家。另外，黄震看出叶适在文章中很少有反对朱熹的言论，但以“忘言”来表述，确实是极不准确的。象朱熹这样在当时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以叶适“忘言”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在笔者看来：叶适确实强调六经统绪，强调学习与理解六经可以致道成德，其余均不足

为法；他也承认功利的重要性，对永嘉学派的功利观点并不是简单的“一洗之”，而是“始同而终异”，即企望以更正统的儒家思想来解释功利，这一极有特色的理论使他更接近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思想，从而与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及陈亮的永康学派有差异。这就是与叶适历史哲学密切关联的功利论成因的根本所在。

注 释:

- [1] [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8《战国策·总论》，中华书局1977年，第260、252页。
- [2] [3] 叶适《叶适集·别集》卷6《三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第723、724页。
- [4] [6]《习学记言序目》卷22《汉书二》，第312页。
- [5]《习学记言序目》卷6《大雅文王之什》，第76页。
- [7]《叶适集·别集》卷2《治势上》，第637页。
- [9]《习学记言序目》卷10《桓公》，第130页。
- [10]《习学记言序目》卷44《荀子》，第646页。
- [11]《习学记言序目》卷6《国风邶》，第71页。
- [12]《习学记言序目》卷50《皇朝文鉴四》，第753页。
- [13] [14] [18] [20] [21] [30]《叶适集·别集》卷6《进卷·管子》，第705、706页。
- [15]《习学记言序目》卷11《定公》，第159页。
- [16] [19]《习学记言序目》卷28《蜀志》，第400、402页。
- [17] 叶适这段话与上述所引“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有矛盾。此类矛盾在叶适著作中并不少见。
- [22] [34]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 [23]《叶适集·别集》卷12《法度总论一》，第786页。
- [24]《习学记言序目》卷20《史记二》，第289页。
- [25]《习学记言序目》卷13《述而》，第186~187页。
- [26]《叶适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第141页。
- [27] 参见拙作《朱熹史学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学术月刊》1999年7期；《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 [28]《习学记言序目》卷12《国语·周语》，第165页。
- [29] 参见拙作《朱熹治史价值论阐微》，载《江海学刊》1998年5期；《朱熹历史哲学的层次分析》，载《朱子学刊》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 [31]《叶适集·别集》卷8《王通》，第742页。
- [32] 参见拙作《试论叶适的道统论》，待刊。
- [33] 吴怀祺先生的力作《中国史学思想史》第八章中指出永嘉诸人在学术上不尽相同，强调永嘉诸人尚不能称之为一个学派。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指出了叶适与陈傅良等人的差异，但仍将叶适归入永嘉学派之中。本文沿用永嘉学派之名，暂不拟对永嘉学派进行考证。
- [35] 黄震《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68《读水心文集》，四库本，第639页。

[责任编辑：杨绍军]